



三蘇評傳

曾枣庄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三蘇評傳

曾枣庄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苏评传/曾枣庄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458-1288-6

I. ①三… II. ①曾… III. ①苏洵(1009-1066)-
评传 ②苏轼(1036-1101)-评传 ③苏辙(1039-1112)-
评传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6900 号

三苏评传

著 者 曾枣庄
责任编辑 孙 莺
封面题签 陈仲文
装帧设计 酆书径
技术编辑 吴 放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 址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200001
www.ewen.co
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35
印 数 1—2000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8-1288-6/K·229
定 价 100.00 元

八十之際謹以此書敬呈三蘇和

三蘇祠

曾秉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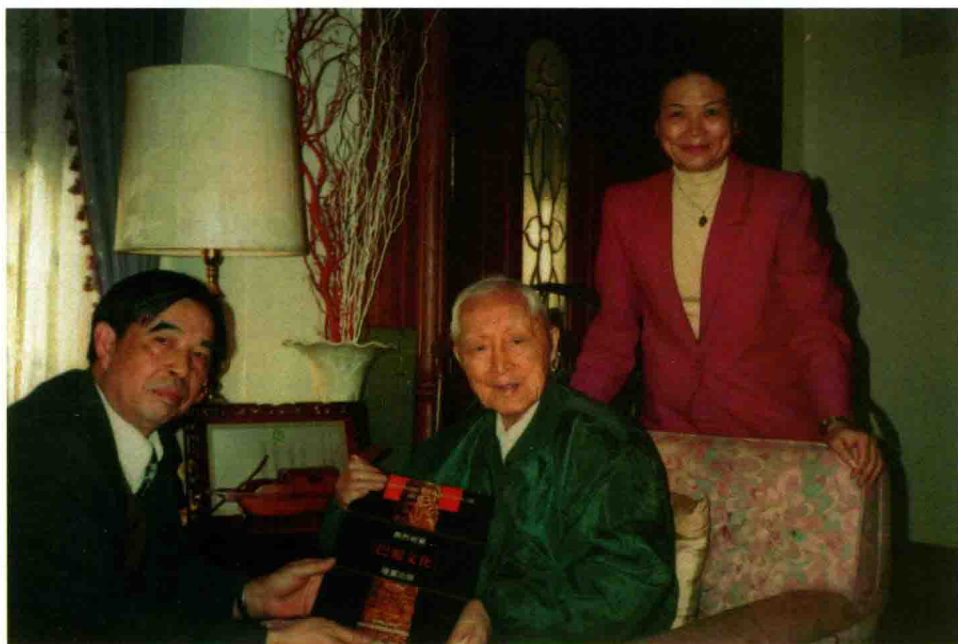
二〇一六、四

眉山昔日生三蘇一山草木
為之枯三蘇今刻映眉山人傑
地靈萬物蘇

曾蒙
二〇一六



2014年7月1日，“曾枣庄学术成果展”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左起：三苏祠博物馆馆长陈仲文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先生、著名学者龚鹏程先生、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本书作者曾枣庄、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女士、著名版本学家刘尚荣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民先生



1996年4月23日，本书作者曾枣庄在台湾陈立夫先生家中向陈先生赠送《巴蜀文化》一书



1986 年，本书作者曾枣庄在家中接待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先生（左二）



1985 年，本书作者曾枣庄与著名学者杨明照（左二）、美国西华盛顿大学教授唐凯琳博士（左三）、文学评论家唐正序（左四）合影



本书作者曾枣庄早年照片



2013 年，本书作者曾枣庄在家中接待著名台湾学者龚鹏程先生



本书作者曾枣庄在日本与著名汉学家村上哲见先生合影



2009年，本书作者曾枣庄与著名学者王水照先生合影



1997年，本书作者曾枣庄与其学生、日本著名苏学家池泽滋子女士合影



2006年，在《全宋文》首发式上，本书作者曾枣庄与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院士（左二）一起向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赠送《全宋文》



三苏祠百坡亭



三苏祠披风树



三苏祠内东坡塑像



三苏祠瑞莲亭和瑞莲池



三苏祠启贤堂



三苏祠抱月亭

自序

三十多年前我曾陆续撰写了《苏轼评传》、《苏洵评传》、《苏辙评传》(以撰写先后为序)。我写《苏轼评传》,完全是出于不平。在一九七五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因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把苏轼定为儒家、反动派、顽固派、典型的投机派。骂苏轼为儒家,我无所谓,即使当时正在崇法批儒,但在我心目中,儒家未必不如法家;骂苏轼为反动派,我也无所谓,这是政治问题,时过境迁,立场一变,结论也会变;骂苏轼是顽固派,我更无所谓,因为顽固也可说是立场坚定,是“不可夺者,峣然之节”(宋孝宗《苏轼特赠太师制》)的另一种说法,是“从来不因自己的利益或舆论的潮流而改变方向”(林语堂《苏东坡传》)。但骂苏轼是“投机派”而且“典型”,我就完全不能接受了,因为这是人品问题。投机者,迎合时机以谋取个人私利是也。在王安石推行新法时,以苏轼的才华,只要稍加附和,进用可必,但他却反对新法,并因此离开朝廷,银铛入狱。在高太后、司马光当政时,以他们对苏轼的器重,只要稍加附和,或稍加收敛,不要锋芒毕露,不难位至宰相;但他却反对尽废新法,并因此而奔波于朝廷和地方上,“坐席未暖,召节已行。筋力疲于往来,日月逝于道路”(苏轼《定州谢到任表》)。世间哪有这样“不合时宜”的“典型投机派”呢?

为回答这些问题,我决心系统研究苏轼,并写成了《苏轼评传》。苏轼同历史上任何一位有贡献的人物一样,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他主张革新政治,但又坚决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和变法实践;他主张抗击辽和西夏的侵扰,但更为关心的是怕这种侵扰引起人民的反抗;他比较关心民间疾苦,在地方上为人民做过不少好事,但对人民的反抗又主张并实行坚决镇压。这一切都是为了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在这个根本出发点上,他同王安石实际上是没有分歧的。他们的分歧只是在于怎样才能更好地巩固宋王朝的统治。王安石变法在当时条件下有一定进步意义,但决不能因此就不敢充分肯定苏轼。王安石变法本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怎么能以王安石为标帜,因为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就全盘否定苏轼呢?苏轼一生都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说他在仁宗朝主张变法,神宗朝才反对变法,哲宗朝又改变了对新法的态度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而且必然会导致苏轼是“动摇的中间派”的结论。为了肯定苏轼,就来尽量缩短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时间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应该如实承认苏轼一生都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一生也都主张革新,只是具体的

革新主张与王安石不同而已。他一生不仅在文学的各个领域颇富革新精神,而且在政治上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丰财”、“强兵”、“择吏”的革新主张,并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宋王朝的“丰财”、“强兵”、“择吏”,为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做了不少工作。他一生光明磊落,直言敢谏,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正如刘安世所说,“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惟己之是信。在元丰不容于元丰,在元祐则虽与老先生(指司马光)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人也”。(宋马永卿《元城语录》卷上)他一生几起几落,但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登州谢宣诏赴阙表》)。因此,我们不能说苏轼是什么顽固派、保守派、投机派或动摇的中间派,而应该承认他基本上属于革新派,比较强调改革吏治,强调渐变,反对骤变,比起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来,苏轼的革新主张具有更多的改良色彩。

我在研究苏轼的过程中,发现苏轼同王安石的政见分歧实际上从苏洵就开始了。过去有人说苏洵的《辨奸论》是伪作,但我从苏洵的其他文章以及苏洵同时代人,特别是苏洵的友人如韩琦、张方平、鲜于侁等人的言论中,发现大量与《辨奸论》相似的观点,证明《辨奸论》对王安石的不指名批评并非“一反众议”,而是当时的“众议”之一,只是用语更加尖锐而已。于是我在研究苏轼大体告一段落后,为进一步研究苏轼的家学渊源,又开始研究苏洵,并撰写了《苏洵评传》。

我在研究苏轼的过程中,还发现苏轼兄弟并非“无不相同”(《宋史·苏辙传》),而是在性格、经历、政治主张、学术观点、文艺思想、诗文风格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多不同。为了比较苏轼兄弟的异同,于是我又撰写了《苏辙评传》。《苏辙评传》也可叫做《苏辙兄弟异同论》。

一九九五年我在这三部《评传》的基础上,经过压缩、调整、补充、修改而撰成《三苏传》,并于一九九六年在台湾学海出版社出版了繁体字本。鉴于我在台湾出版的《论西崑体》,由于书价原因,大陆读者根本见不到书。其后我在台湾出书,都事先说好,两岸都将出版,因为古典文学研究著作的主要读者还是在大陆。本书也一样,我同学海出版社社长李善馨先生达成谅解,此书过一段时间还将在大陆出版简体字本。可惜李先生现已去世,而此书一直未在大陆出版简体字本。台湾版的《三苏传》共分六十节,这次出版基本上保持原貌,但也有一些修改,包括标题都有修改。台湾版附有附录五篇,这次却有较大增补,并新增了五篇有助于了解三苏生平的附录,兹说明如下:因为至今仍有人误以为苏洵号老泉,故附录了《老泉非苏洵之号》。我本来分别发表过《三苏后代考》和《三苏姻亲考》,后合并为《三苏世系和姻亲述略》,作为附录二。因为古今的苏轼年谱多如牛毛,我未再撰苏轼年谱,故仍保留了原附的《三苏年谱简编》,一则可局部代替未撰的苏轼年谱,更重要的是便于了解同一时间三苏各自在做什么。《苏洵评传》所附《苏洵年谱》,《苏辙评传》所附《苏辙年谱》,是较早的苏洵、苏辙年谱,是这两部《评传》最有价值的部分,现在有了孔繁礼先生为三苏所撰的

年谱,本已没有存在的价值,但孔谱太详,我这两种不足十万字的年谱也许仍便于检阅。《三苏著述简介》、《著者三苏研究编著目录》、《主要参考书目》都是原有的,这次做了较多补叙。因为本书评论的成分仍较大,又为与台湾版《三苏传》相区别,故名《三苏评传》。这就是本书的撰写、修订过程。

有人说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我却认为爱情最多只能算文学的永恒题材,理想同现实的矛盾才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矛盾,也是文学的永恒主题。我研究三苏,常为他们的伟大抱负所感动,也常为他们的理想均无法实现而哀叹。三苏生活的年代,是北宋王朝的全盛年代,也是北宋王朝由盛到衰,危机四伏的年代。在他们生活的一百零四年(1009—1112)里,宋王朝为巩固自身统治,进行过两次大的改革。一是庆历新政,仅推行了一年多就失败了;二是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推行了十多年,围绕熙宁变法的斗争几乎长达半个世纪,带来的不是宋王朝统治的巩固,而是北宋的灭亡。苏洵“亲见”了第一次变革的失败,他言庆历新政及其失败说:“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苏轼兄弟则直接卷入了围绕熙宁变法所进行的斗争。三苏父子都想“致君尧舜”,但他们历仕的五个皇帝(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总体上说,真可谓“一蟹不如一蟹”,最后竟“致”出了宋徽宗这样的昏君、亡国之君,在苏辙死后十五年北宋就灭亡了。

被誉为有“王佐才”的苏洵,“爵不过于九品”,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宋仁宗读到苏轼兄弟的应试文章,“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史·苏轼传》)但苏轼从仕四十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贬所度过的,以至他于临死前,在《自题金山画像》中发出了“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哀叹。苏辙好一些,“爵齿皆优于兄”,位至副相。但在宋徽宗的黑暗统治下,他也只好“闭门不出十年久”,根本不敢再过问政事,在默默无闻中死去。可悲的社会现实和三苏父子的不幸经历都是对他们的美妙理想的无情讽刺。

苏洵曾教育二子说:“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也;不幸不用,犹当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闻焉。”(苏轼《历代论序》)苏洵是这样要求自己的,苏轼兄弟也是铭记着这一先君的遗训的。他们在政治上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后,都集中精力于著书立说。他们都很看重自己的学术著作,用苏轼的话说就是:“抚视《易》(传)、《书》(传)、《论语》(说)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其他何足道!”(苏轼《答苏伯固》)但三苏父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和影响,却不在他们的学术著作,而是在他们视为“不足道”的文学成就。理想同现实、目的和结果的差距实在太远了!

聊可为慰的是,“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宋孝宗《苏轼特赠太师制》),这三位“一时之杰”,终成为“百世之师”。历史毕竟是公正的!

我与三苏祠(又序)

我想,很少有一个人,在数十年前偶然着手一项影响他一生的工作时,能想到他已经与一座祠堂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很少有一个人,毕生的研究耕耘,会与一座离他不远的祠堂,有完全分不开的关系;很少有一个人,一生的景仰和探寻,其实冥冥之中就是源于一座祠堂;很少有一个人,一生的努力,会得到一座祠堂如此不遗余力的支持;很少有一个人,会认为他一生的心血和积累,只有回归一座祠堂,才有回家的感觉,像堂主之一东坡先生所说——“此心安处是吾乡”。

这个幸运的人是我,这座祠堂就是先贤诞生之地——四川眉山三苏祠。

其实这个人不仅仅是我,是世界上所有景仰三苏的人,是世界上所有膜拜三苏祠的人;这座祠堂,也不仅仅是三苏祠,是三苏父子足迹曾经到过的每一个地方,是三苏父子曾经歌咏赞美过的每一寸土地。

我,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不过是千千万万热爱三苏、膜拜三苏祠的人群中的一员,微不足道,却不能不说三苏祠:

三苏祠,位于四川西南眉山市中心城区纱縠行南街,分别距成都、乐山八十公里,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的故居。明代洪武元年(1368),改宅为祠,祭祀三苏,不幸明末毁于兵燹。清康熙四年(1665),在原址上模拟重建,现已成为占地一百余亩的古典式园林。三苏祠庭院,一直是文人墨客和民众拜祭先贤三苏的地方,经数百年营造,红墙环抱,绿水萦绕,荷池相通,古木扶疏,小桥频架;堂馆亭榭,错落有致,掩映于翠竹浓荫之中,形成“三分水,二分竹”的岛居特色。其楼台亭榭,古朴典雅;其匾额对联,词意隽永。祠内有苏洵、苏轼、苏辙和程夫人、任采莲、苏八娘、王弗、王闰之、王朝云、史夫人及苏家六公子等十余人的塑像,供奉着眉山始祖苏味道的画像和列代先祖先君的牌位;有木假山堂、古井、洗砚池、荔枝树等苏家遗迹;有苏轼等人的手迹刻石八十余通,有宋、明、清、民国碑石三十余通;收藏有上万件有关三苏的文献资料和文物:是蜀中最负盛名的人文景观,是国内规模最大、唯一具有本源性的三苏遗迹,是全世界热爱三苏的人们以及苏氏宗亲的圣地。所以元人欧阳玄说:“眉山昔日生三苏,一山草木为之枯。”清代宰相张鹏翮说:“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朱德元帅说:“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